十九世紀末新加坡「廣東人」地緣概念的多重意涵

——廣惠肇碧山亭《勸捐碧山亭小引及捐款芳名》研究

陳康言
香港都會大學
伍絜宜人文社會科學院

武琦
新加坡社科大學
人文與行為科學學院、中華學術中心

提要

在新加坡的語境下，「廣東人」是一個不斷地被形塑的概念。「廣東人」並非狹義地指操粵語的群體，亦非泛指來自廣東省的移民，而是被理解為來自清代建置下的廣州府、肇慶府及惠州府的移民。借用人類學家巴特 (Fredrik Barth) 的概念，「廣東人」作為種族去理解，並不是一個本質上的存在，而是在不同歷史時空之下所產生的概念。本文藉由探討廣惠肇碧山亭的第一塊碑銘《勸捐碧山亭小引及捐款芳名》，以追溯「廣東人」這個概念在19世紀新加坡的建構與形成。前人的研究已經梳理出碧山亭成立的歷史因素及往後的發展脈絡，但有關碧山亭成立之初與廣幫人士和組織的關係，則鮮有文獻記述，而《勸捐碧山亭小引及捐款芳名》的捐款人名錄，恰能提供更多資訊以了解在19世紀末廣幫社群的內部結構。本文將圍繞此碑銘，並輔以大量歷史材料，嘗試建構出在19世紀末的新加坡「廣東人」此一地緣概念的形成與意涵。

陳康言，香港都會大學伍絜宜人文社會科學院，香港九龍何文田牧愛街30號 A 座6樓615室，電郵：chanhy@hkmu.edu.hk；武琦，新加坡社科大學人文與行為科學學院、中華學術中心，新加坡金文泰道463號，郵編：599494，電郵：wuqi@ suss.edu.sg。

本研究由新加坡國家文物局的文化遺產研究津貼計劃支持。本文的內容僅為作者的個人意見，並非反映新加坡國家文物局的立場與看法。

關鍵詞：新加坡、廣惠肇碧山亭、廣東人、廣幫、《勸捐碧山亭小引及捐款芳名》

一、問題意識

在新加坡華人研究的領域之中，殖民地時期華人社會的結構與發展，一直都是重要的研究課題。自上世紀50年代起，斐利民（Maurice Freedman）、艾略特（Alan Elliott）、托普利（Marjorie Topley）等英國學者對新加坡華人研究的著作面世以來，人類學的結構功能主義（Structural functionalism），便成為學界普遍研究新加坡華人社會建構與形態的方法論。① 由於在冷戰時期，西方學者難以進入中國大陸，往往會視海外華人社區，包括新加坡，為傳統中國社會原型的縮影。之後的學者亦大多承繼他們的研究方向，將新加坡華人社會看作是漢人社會，特別是閩粵兩地在海外的延續。

而學界最關注的研究對象，即為華人社團，其中包括宗鄉會館、行業組織、秘密會社等。這是由於在英國殖民地政府「分而治之」的政策下，華人社會儼如半自治的社會型態，② 華人社團組織更承擔了部分政府的職能。華人群體的政治結構、經濟發展等，都與華人社團有非常密切的關係。這些都在顏清湟的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討論。③ 正因如此，克里斯曼（Lawrence W. Crissman）便留意到華人社團的組織原則，乃是與中國，尤其是閩粵兩地的地域規劃、語言結構、親屬關係等諸多元素有關。他所提出的「分層結構」（segmentary structure）理論，乃視海外華人社會為中國行政結構的延伸。他的研究將華人社會劃成為金字塔結構的分層原則，而當中則以同鄉地源、方言運用以及宗親血緣為大原則。④

需要注意的是，在新加坡的語境之下，這些同鄉、同方言、同宗的社群模式，亦衍生出與社團分析架框並列而行的「幫」群組織。早於1881年，殖

---

① Maurice Freedman, *Chinese Family and Marriage in Singapore*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57); Alan J. A. Elliott, *Chinese Spirit-medium Cults in Singapore*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1955); Marjorie Topley, *Cantonese Society i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Gender, Religion, Medicine and Money*, ed. and intro. by Jean DeBernard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2011).

② Carl A., Trocki, *Singapore: Wealth, Power and the Culture of Control* (London: Routledge, 2006), 34.

③ Ching-Hwa Yen,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00-1911*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④ Lawrence William Crissman, "The Segmentary Structure of Urban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Man* 2:2 (1967): 185-204.

民地政府已注意到華人社群的內部差異性。當時的華民助理政務司鄧尼斯(Nicolas Belfield Dennys) 提出了華人「方言」的概念，並以「部落」(tribes) 一詞，去解釋華人社群內部的差異性與複雜性。⑤ 新加坡的五大方言群（福建、潮州、廣東、客家、海南）的分類模式，便是由此而來。⑥ 在往後殖民地的人口普查中，雖然曾作出些許改動，但仍然以鄧尼斯的分類為基礎。⑦ 乃至在1970年新加坡獨立以後所進行的首次人口普查，亦以相類近的分類模式，去了解華人社群的內部多元性。⑧

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以方言為基礎的「幫」群組織，成為研究新加坡華人社會結構與特徵的主要研究對象。最具代表性的學者就是麥留芳，他的研究關注了地域認同與方言認同之間的相互作用。他認為「幫」群組織更強調的是語言的基礎。⑨ 林孝勝的研究則關注「幫」群組織的性質與演變。他點出自19世紀到20世紀中葉，華人社會在「幫」的框架之下，相互之間所形成的經濟力量、政治對立等問題。⑩

近年來，隨着愈來愈多資料的挖掘與開放，對於華人社團與「幫」群的研究，已有進一步的拓展與討論。比如李志賢所提到的新加坡潮州社群與原鄉的關係，⑪ 黃賢強所關注的新加坡客家社群的發展，⑫ 曾玲所探討的廣客七屬社群的分與合，⑬ 都是在更豐富的歷史素材下，闡述了新加坡華人社會的內在結構與運作方法。跟前人的研究相比，他們的研究已漸漸跳脫出把新

---

⑤ Nicholas Belfield Dennys, *A Descriptive Dictionary of British Malaya* (London: "London and China Telegraph" Office, 1894), 191.

⑥ *Censu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3*rd April, 1881*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81), 4.

⑦ Charles Hirschman, "The Meaning and Measurement of Ethnicity in Malaysia: An Analysis of Census Classification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6: 3 (1987): 564.

⑧ P. Arumainathan, *Report on the Census of Population 1970, Singapore*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3), 247.

⑨ 麥留芳，《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5）。

⑩ 林孝勝，《新加坡華社與華商》（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5）。

⑪ 李志賢，《海外潮人的移民經驗》（新加坡：潮州八邑會館、八方文化企業公司，2003）。

⑫ 黃賢強，《新加坡客家文化與社群》（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聯合出版，2008）。

⑬ 曾玲，《福德祠綠野亭發展史：1824—2004》（新加坡：華裔館，2005）。

加坡華人社會視作漢人傳統社會原型的參照，而更重視華人在新加坡歷史發展脈絡下的角色。除了有關新加坡華人社群的研究外，陳景熙對砂拉越古晉潮州社群的研究也具參考價值。透過細讀當地潮人義山「粵山亭」以及「玄天上帝廟」的文獻記錄，他指出海外華人在僑居地的社會結構，同樣以義山與廟宇為重要紐帶，凝聚了當地的潮屬社群。⑭

然而，現在有關「幫」群組織的研究，尚有進一步的思考空間。例如，曾玲與莊英章透過廣惠肇碧山亭的個案，探討廣惠肇三屬人士由原鄉所帶來的傳統文化是如何結合新加坡的特殊歷史地景，從而產生出一種具有新加坡本土色彩的文化與社會型態。⑮ 他們的研究雖然有機地結合了原鄉和居住地之間的連繫，但卻沒有闡述碧山亭的成立與發展如何突顯出三屬社群所展現的廣東性（Cantoneseness）。同樣地，蔡志祥對於碧山亭最大型的宗教活動——「萬緣勝會」的研究，雖然強調廣東移民在新加坡如何延續原鄉的宗教活動的同時，結合了新的在地化元素，但對於三屬社群的形成與內涵，卻鮮有着墨。⑯

由於現有對於華人「幫」群組織的研究，大都仍停留在宏觀的論述層面，而相對缺少微觀的分析。本文希望籍由詳細探討廣惠肇碧山亭的第一塊碑銘 ——《勸捐碧山亭小引及捐款芳名》，以補充這個研究上缺失的一塊。碧山亭成立於1870年，是新加坡現存唯一仍然以「幫」群組織為基礎運營的墳場管理組織。1890年所立的《勸捐碧山亭小引及捐款芳名》是廣惠肇碧山亭現存最早，也是唯一於19世紀所立的碑銘。該碑不但記載了廣幫先賢籌款建墳的事宜，更紀錄了大量的人名與商號，這不但反映出廣幫的內部結構，更彰顯了廣東人在19世紀新加坡的多重意涵。因此，本文透過詳細查找碑銘上的名字與商號，並輔以大量華文報章的報導與廣幫會館的史料，重點考察19世紀末的廣幫社群，並以這個案反思現有對新加坡「幫」群組織的研究，進而對「幫」群組織的內涵提出新的思考。

---

⑭ 陳景熙，〈廟宇、義山與海外華人社會建構：19世紀砂拉越古晉潮人社會的案例〉，《世界宗教研究》，2020年，第2期，頁109—121。

⑮ 曾玲、莊英章，《新加坡華人的祖先崇拜與宗鄉社群整合：以戰後三十年廣惠肇碧山亭為例》（臺北：唐山出版社，2000）。

⑯ Chi-Cheung Choi, "Ancestors Are Watching: Ritual and Governance at Peck San Theng, a Chinese Afterlife Care Organization in Singapore," *Religions* 11: 8 (2020): 382, 詳見: https://www.mdpi.com/2077-1444/11/8/382.

二、「粵」的多重意義

「廣東人」，乃是「廣府人」的代稱，並非泛指整個廣東地區的人口，而是普遍被理解為祖籍來自於華南地區廣東省珠江三角洲一帶以粵語為母語的群體。然而，單單以地理邊界或語言去定義「廣東人」也不一定準確，因為地理邊界會隨着時代變遷而頻繁地更改，而語言亦會因年代的更迭而出現差異。從地理上看，廣東與中國核心地區相距甚遠。在歷史上，不管是以長安還是以北京為中心，廣東一直位於帝國的邊陲位置，是一個被邊緣化的地域。在不同的記載中，廣東地域往往被貼上「未開化」或「不文明」等標籤。劉介民與劉小晨認為，廣東的邊緣性，始於漢代以來，強勢的中原文化入主南方並與在地的南越文化相遇，所形成的一個獨特且以漢文化為中心霸權的傳統。[17] 在帝國的中央文化霸權影響之下，位處華南邊陲地域的人，會因應時代的更迭而對中央或自身的文化意涵形成不一樣的理解方式。[18]

故此，「廣東人」並非本質上固定不變的群體，而是會隨着時間與空間的不同而衍生出不一樣的定義。人類學家巴特（Fredrik Barth）指出種族（ethnicity）是一個由社會建構而成的概念，而族群邊界（ethnic boundary）是不同群體在互動過程中體現出來的，充滿着流動性和張力。[19] 借用巴特的概念去理解「廣東人」的形成，就會發現「廣東人」並不是一個本質上的存在，而是在不同歷史時空語境之下所產生的文化概念；是游走於自我定位與他人定義之間，在不同力量角力之下所衍生的歷史概念。在凱大熊（Calvin Caricco）對「廣東人」的論述中，這種看法得到了充分的闡述。他認為「廣東人」並不是一個單純的文化與地理的分類，而是一個與階級、權力相互交織的概念。他指出「廣東人」的身分認同，不但是具爭辯性的，而且是負載着權力（power-laden）的，在歷史上不斷地建構與重構。他指出，在明清帝國之際，位於帝國邊緣位置的廣東人，不斷與帝國大一統的文化概念互動。

---

⑰ 劉介民、劉小晨，〈廣府民俗與培育世界文化名城〉，《城市觀察》，2012年，第4期，頁182—189。

⑱ Myron L. Cohen, "Being Chinese: The Peripheralization of Traditional Identity," in *Kinship, Contract, Community and State*, eds. Myron L. Cohen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39-59.

⑲ Fredrik Barth, "Introduction," in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eds. Fredrik Barth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9), 9-10.

廣東人身分的建立，就是一個不斷重新定位自己（re-centering）與反邊緣化（counter-marginalization）的過程。[20]

一眾以香港為主要田野考察點的歷史人類學者，包括華琛（James Watson）、華德英（Barbara Ward）、蕭鳳霞（Helen Siu）、劉志偉等，都留意到在珠江三角洲一帶的民眾，會挪用帝國的文化符號，以建構自我的身分。華琛提出「標準化」（standardization）的概念，指出國家將神明賜予封號的行為，是國家直接介入宗教以作文化擴張的表現。而香港新界地區的士紳亦會借用此帝國宗教的文化符號，以合法化地方信仰的崇拜。[21] 華德英亦提出「意識模型」（conscious model）的分析框架，透過在西貢滘西洲漁民的經驗，建構出三種意識模型，以代表我對自己周圍的社群的看法 、我對自己群體的看法以及我對我的社群所歸屬的社會的看法。第三種的模型，正代表着漁民對帝國文化秩序的想像，以建立自我的文化認同。[22] 蕭鳳霞和劉志偉亦曾以廣東蜑家社群的歷史為研究對象，一方面指出國家的話語透滲至地方的經濟活動、宗教儀式，另一方面，地方上的力量亦會巧妙地運用帝國政權的符號象徵，以建立並鞏固自己的在地力量。[23]

縱使上述學者的田野資料不盡相同，但都強調了人的能動主體（human agent），而且亦指向同一個情況：廣東地域的邊緣性，使得在這地域的不同群體，需要從帝國的霸權文化之下，挪用不同的文化符號，以建立自我的身分。因此，「廣東人」的身分是多重定義的。蕭鳳霞亦表示，在這片疆域下

---

⑳ Kelvin Carrico, "The Cantonese in and beyond the Han," in *Critical Han Studies: The History, Representation, and Identity of China's Majority*, ed. Thomas S. Mullaney, James Leibold, Stephane Gros, and Eric Vanden Bussche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 23-27.

㉑ James L. Watson, "Standardizing the Gods: The Promotion of *Tian Hou* (Empress of Heaven) along the South China Coast, 960-1960," in *Village Life in Hong Kong: Politics, Gender, and Ritual in the New Territories*, ed. James L. Watson and Rubie S. Watson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1), 269-310.

㉒ Barbara E. Ward, "Sociological Self-awareness: Some Uses of the Conscious Models," in *Through Other Eyes: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Conscious Models'-Mostly in Hong Kong*, ed. Barbara E. Ward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5), 61-78.

㉓ Helen F. Siu, and Zhi-Wei Liu, "Lineage, Market, Pirate, and Dan: Ethnicity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of South China," in *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ed. Pamela Kyle Crossley, Helen F. Siu, and Donald S. Sutton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285-310.

之下的文化身分，是籠統的、經常變化的，而且是由各方力量商議妥協而成的，因此難以定出一套具體、可客觀識別的文化認同。[24]

透過人類學的田野考察，這些學者已印證了帝國文化的符號會反覆出現在廣東地域中，尤其是相對原始的農業社會之中。事實上，在香港新界的漁村或鄉間地方的民眾，確實可被視為帝國的部分延伸。因為在歷史上，在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簽訂以前，香港的新界部分不屬於英國殖民地所管轄的範圍。但這亦引申出另一個討論點，那就是在移民社會中，特別是在非鄉間的城市化殖民地之下，又應該如何去理解「廣東人」的社群？巧合的是，不少海外華人研究的學者，在理解「廣東人」及其文化時，也發現到當中的模糊性。由珠三角一帶出發，廣東移民的軌跡遍及海外與內陸，這不單擴張了「廣東人」的地理空間，亦在原鄉與新住地之間，建構了更為多元的文化身分。

徐元音 (Madeline Hsu) 在研究美國臺山人的跨國歷史時，提到臺山人的文化認同，是通過跨國族群所彰顯出來，而非源自於祖籍地本身。自19世紀以來，反倒是在北美地區的臺山移民潮，持續加強了自身臺山人的身分認同。[25] 麥哲維 (Steven Miles) 更是認為，廣東地區的移民潮早已在16世紀出現。在明清時期，廣東地區的民眾沿西江而上，並在帝國動亂之際，轉換自身的社會與經濟角色，由移民蛻變為商人，再成為居住地的士紳精英。[26] 兩位學者分別以內部移民 (internal diaspora) 與海外移民 (global diaspora) 這兩個維度，理解廣東地區移民的身分建構，是一種跨地域的連結。麥哲維更從中強調語言的重要性，他認為廣東移民群體的遷徙軌跡，是與特定的方言群體相對應的。[27] 黃以琳和林大偉在研究日本橫濱唐人街的廣東移民社群時，則認為相比起語言，當地的廣東社群會以其他元素，包括宗教、節慶活動

---

[24] Helen F. Siu,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in South China," in *Tracing China: A Forty-Year Ethnographic Journey*, ed. Helen F. Siu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30-32.

[25] Madeline Y. Hsu, *Dreaming of Gold, Dreaming of Home: Transnationalism and Mig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China, 1882-1943*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26] Steven B. Miles, *Opportunity in Crisis: Cantonese Migrants and the State in Late Qing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re, 2021).

[27] Steven B. Miles, *Chinese Diasporas: A Social History of Global Migr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等，以建構自身的廣東人身分。[28] 由此可見，不僅在華南地區，在不同地方的廣東移民，都對「廣東人」的身分有着不一樣的定義與理解。

本文借鑑這一系列由帝國時期的廣東原鄉地域到海外廣東人社群的研究，以提出研究新加坡廣東社群的基本問題：何謂「廣東人」？「廣東人」是一個充滿張力、流動性，且模糊的概念。「廣東人」的本質會隨着歷史語境與場域的變遷而改變。這個多元、複雜的文化概念在19世紀的新加坡，一個非廣東人原鄉且屬於英國殖民地的時空地景之下，又會呈現出一副怎樣的面貌？在深入探討廣惠肇碧山亭的成立與碑銘的內容之前，需要先了解在19世紀末期，廣東社群在新加坡華人社群中，是怎樣被理解的。

三、19世紀新加坡華社中的廣東人

自1819年柔佛蘇丹將新加坡割讓予英屬東印度公司起，新加坡便正式成為英國的海外殖民地之一。1826年，東印度公司更將新加坡、馬六甲與檳城，整合為海峽殖民地，以便統一行政，方便管理。大量來自中國閩粵兩省的勞動人口，亦因海峽殖民地優厚的經濟條件，以及原鄉地各種不利的生活條件，而選擇乘坐俗稱「大眼雞」的帆船，飄洋至新加坡。[29]

殖民地下的新加坡，是一個擁有高度多元性的社會。在歐洲人、華人、馬來人、印度人的基本劃分之下，殖民地政府以「分而治之」的政策，以應對新加坡複雜的多元社會。[30] 1822年實行的傑克遜計劃 (Jackson Plan)，是新加坡第一個城市規劃藍圖。在此規劃下，新加坡中心地帶被劃分為多個民族區域，華人則被分配至新加坡河南邊的下游位置，並組成了華人甘榜 (Campong China)。[31] 華人內部各個不同語言群體的居住空間，則被更仔細地區分開來，不同的方言群被規劃住在不同的街道之中。因此，殖民地政府這種不干預的社會政策，在一方面阻礙了種族之間的融合，但在另一方面則促進了華人社群內部文化身分的建立。

㉘ Yee-Lam Elim Wong, and Tai-Wei Lam,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Cantonese Migrants in Yokohama Chinatown: A Case Study of Shatenki and the Xie Family* (Singapore: Springer Singapore; Imprint: Palgrave Macmillian, 2021).

㉙ 李國樑，《大眼雞・越洋人》（新加坡：水木坊，2017），頁10。

㉚ Trocki, *Singapore: Wealth, Power and the Culture of Control*, 34.

㉛ Edmund Waller, *Landscape Planning in Singapore*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2001), 23-25.

華人的「幫」群結構，便是在這背景之下所形成。林孝勝指出，「幫」群組織是一個以語言為基礎的社群網絡，從中成立地緣會館、血緣宗親會、業緣行會、義山組織，以及秘密會社等不同類型的組織。這些組織建基於地緣、血緣、語言等原則，而且具備強烈的排他性與封閉性，這反映出19世紀時華人社群內部之間的矛盾。[32] 殖民地政府亦留意到華人社群間的多元性，在1855年的《海峽殖民地年度報告》(Annu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中，曾提及在殖民地的華人會依附於特定的社團，並且會與殖民地政府保持着一定的距離。[33]

華人「幫」群之間的分與合，形成了所謂的「幫」群政治。在19世紀的新加坡，「幫」群政治所呈現的是兩極性對立的情況：一方是人數眾多、勢力龐大的「閩」幫，另一方則是由數個幫群組成的「粵」幫聯合陣線。[34]「閩」是指來自於福建南部地區，以閩南語泉漳片廈門話為溝通語言的閩南人社群。[35] 但「粵」在這語境之下，並非單指操粵語的廣東人，而是泛指幾個來自清代建置下廣東省的不同方言群體，包括潮州、廣東、客家和海南社群。[36]

當時，位於直落亞逸街(Telok Ayer Street)的天福宮為閩幫的領導中心；而位於菲立街(Philip Street)的粵海清廟，即為粵幫的核心機構。因此，粵海清廟的「粵」，所闡述的正是一種跨越方言界限的想像，是幾個在人口以及經濟力量上相對較為邊緣的群體所組成的聯合陣線。[37] 雖然粵海清廟是由潮幫所成立並管理，但在廟裡卻能夠找到由廣東的廣惠肇社群、客家的應和會館，以及瓊州商家，分別以「沐恩弟子廣惠肇眾信」、「應和會館眾等」、「沐恩瓊州眾信」等名義，在19世紀不同時期所贈送的多片匾額以

32　林孝勝，〈神權・紳權・幫權——幫權結構與幫權政治〉，載柯木林編，《新加坡華人通史》(新加坡：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2015)，頁78。

33　"Report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During the Year 1855-1856," in *Annu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55-1941, Volume I*, ed. Robert L. Jarman (London: Archive Editions Limited, 1998), 22-24.

34　林孝勝，〈神權・紳權・幫權——幫權結構與幫權政治〉，頁78。

35　林孝勝，〈神權・紳權・幫權——幫權結構與幫權政治〉，頁79。

36　林孝勝，〈神權・紳權・幫權——幫權結構與幫權政治〉，頁80。

37　陳康言，〈方言以外：新加坡廣東人的(再)定義〉，載邱克威等編，《蛻變中的馬來西亞與東南亞華人社會——2021年第五屆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國際雙年會論文集》(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2022)，頁501—503。

及樑題。[38] 在不少宗教與社會事件上，比如粵海清廟的遊神活動[39] 和1854年福建與潮州人爆發的衝突之時，[40] 廣東、客家和海南社群都是積極地支持着潮州社群的。因此，「粵」在新加坡殖民地建立之初，是代表了這個跨方言的聯合陣線。

在「粵」幫聯合陣線中，廣東移民與客家移民的關係則顯得更為緊密。這是由於跟福建社群和潮州社群相比，廣、客兩幫的經濟力量較弱，需要把力量整合起來。因此，自19世紀二三十年代起，廣、客移民已積極地，如曾玲所指，在「幫」群林立的新加坡華人社會中，建立起緊密的關係，以凝聚社群成員的向心力。[41] 早在1838年，來自廣州府、惠州府、肇慶府、嘉應州、大埔縣、豐順縣、永定縣七地的廣東與客家移民，共同建立了墳山組織青山亭。根據《福德祠綠野亭沿革史特刊》記載，廣客七屬社群於1838年，在牛車水安祥山以東之地建立了青山亭。到了1840年代，由於青山亭墳山瀕臨飽和，七屬組織於1840年另覓新地，並興建了綠野亭。[42] 在1840年的《廣東省永定縣重修塚山碑記》中，更清楚地表明「我廣、惠、肇、嘉應州、大埔、豐順、永定等庶」，以「我」一詞代表了七屬社群。[43] 這反映了廣、客兩幫已建立出跨越幫派的聯盟。

除此之外，廟宇海唇福德祠是七屬組織的另一個聯合機構。福德祠於1824年由「廣惠肇」社群建立。但自1850年代以後，客家社群亦參與了福德祠的運作。1854年，廣東與客家社群分別豎立了兩塊《重修大伯公廟眾信捐題芳名》碑銘，這顯示了廣東與客家社群共同營運福德祠。透過經營青山亭、綠野亭、福德祠，廣客兩幫共同組成了更為牢固的聯盟。[44] 由此可見，相比起其他的幫群，廣東人與客家人在19世紀前期，已建立了非常緊密的聯繫。

㊳ 丁荷生、許源泰，《新加坡華文銘刻彙編 1819—1911（上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頁11—15。

㊴ 林孝勝，〈神權・紳權・幫權——幫權結構與幫權政治〉，頁84。

㊵ Jonas Daniel Vaughan,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99.

㊶ 曾玲，《福德祠綠野亭發展史： 1824—2004》，頁 vi。

㊷ 陶公鑄，〈福德祠綠野亭沿革史〉，載福德祠綠野亭公會編，《福德祠綠野亭沿革史特刊》（新加坡：福德祠綠野亭公會，1963），頁1。

㊸ 丁荷生、許源泰，《新加坡華文銘刻彙編 1819—1911（上冊）》，頁181。

㊹ 陳康言，〈方言以外：新加坡廣東人的（再）定義〉，頁504—506。

但曾玲亦指出廣、客移民的聯盟，實為一種結構鬆散的聯盟。她認為七屬組織是「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社群形態。[45] 她利用眾多綠野亭碑文的內容，指出七屬組織再細分為廣幫的「廣惠肇」社群，以及客幫的「嘉應五屬」和「豐永大」社群，這3個社群構成了綠野亭的基本架構。綠野亭在管理運作、利益分配等各方面，都是以這3個社群為劃分基礎。[46] 1886年所立的《福德祠二司祝訟公碑》，反映了七屬社群內部之間的利益衝突與矛盾，但亦確立了七屬組織的內部架構。根據碑文的內容，七屬組織分為「廣惠肇」與「嘉應豐永大」兩方，亦即是廣幫與客幫，並以此基礎作適當的權利與義務劃分。[47]

七屬組織的內在結構性矛盾與分歧，以及自19世紀80年代起新加坡華人社會的轉變，都促成了廣、客兩幫各自建立新的總機構。在人口上，華人移民人口持續增長。在1881年的人口調查中，新加坡華人人口突破了86000人，當中廣東人人口高達14000多人，而客家人人口也有6000多人。[48] 此外，長期關係緊張的「幫」群政治結構亦開始出現轉變，兩極化的情況變得松懈，越來越多的跨幫群合作不斷發生，這包括跨幫群組織 —— 同濟醫院的成立。[49] 在這時代背景之下，廣幫的「廣惠肇」社群亦建立起新的墳山組織 —— 廣惠肇碧山亭。

四、《勸捐碧山亭小引及捐款芳名》與19世紀的新加坡廣東人

廣惠肇碧山亭的成立，意味着新加坡的廣、客兩幫，迎來了新的整合，亦即是操粵語的廣州府與肇慶府移民，與操客語的惠州府移民，逐步建立出跨地域與方言的「廣惠肇」三屬認同。惠州移民會與廣、肇兩府移民共同建立「廣惠肇」社群，是由於惠州移民南下新加坡時，大多跟廣、肇移民一樣取道自廣州城。此外，在地理位置上，惠州府與廣州府相鄰，大多數人亦通

45　曾玲，〈廣客幫總機構——從海唇福德祠到綠野亭公所〉，載柯木林編，《新加坡華人通史》（新加坡：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2015），頁116—118。

46　曾玲，〈廣客幫總機構——從海唇福德祠到綠野亭公所〉，頁116—118。

47　丁荷生、許源泰，《新加坡華文銘刻彙編 1819—1911（上冊）》，頁53。

48　*Censu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3*rd April,* 1881, 4.

49　黃賢強，〈從「幫群共治」到「幫群隱治」：同濟醫院領導層的跨方言群結構和演變〉，載杜南發、梁秉賦主編，《同濟醫院 150 週年文集》（新加坡：同濟醫院，2017），頁135—137。

曉粵語。[50] 這都使得惠州客家人與廣、肇兩府的廣東人連結在一起。粵語亦成為凝聚三屬社群的重要紐帶。直到今日，碧山亭在大會會議上，仍以粵語為主要溝通語言。[51]

碧山亭具體的成立年分不詳，但根據1960年發行的《新加坡廣惠肇碧山亭萬緣勝會特刊》所記，早於同治五年（1866），粵籍商人梅南瑞已號召廣、惠、肇三屬同仁捐錢購置墳地，故碧山亭成立年分應該在1870年前後。[52] 在1890年的《勸捐碧山亭小引及捐款芳名》中，便提及「創買碧山亭地梅南瑞」。[53] 同時，碑文亦記載了「求免地稅胡旋基大人」。[54] 胡旋基即「黃埔先生」胡亞基。胡亞基是19世紀重要的廣幫僑領，他與殖民地政府交好，故能運用自身的能力，向政府「求免地稅」，以興建碧山亭。同時，他與清政府關係良好，亦是第一任清朝駐新加坡的總領事。[55] 為了進一步了解廣惠肇社群在這時期的發展與內部結構，下文將詳細說明《勸捐碧山亭小引及捐款芳名》中捐贈者及主事者相關的歷史訊息。

（一）《勸捐碧山亭小引及捐款芳名》的基本資料

《勸捐碧山亭小引及捐款芳名》是碧山亭現存年代最為久遠，且是唯一於19世紀豎立的碑銘。該石碑共分為上、下兩片。上片的前半部分，描述了立碑的因由、碧山亭成立之初的管理問題、捐款款項的運用等資料。上片的下半部分以及下片的內容，即記錄了以大總理梅湛軒為首，一眾時任值理的名字；並以捐款款項的多寡順序詳細記錄了捐款者與捐款商號的名字。碑文的開首，先說明了建亭的目的，是因為「念自通商以來，吾人之外出者源源不竭，如分流之水，如恆河之沙，早以敦梓里於天南，聚萍踪於石叻，間有

50　李國樑，《大眼雞・越洋人》，頁15。

51　Choi, “Ancestors Are Watching: Ritual and Governance at Peck San Theng, a Chinese Afterlife Care Organization in Singapore,” 4.

52　廣惠肇碧山亭萬緣勝會出版委員會，〈廣惠肇碧山亭沿革史〉，載新加坡廣惠肇碧山亭萬緣勝會編輯委員會編，《新加坡廣惠肇碧山亭萬緣勝會特刊》（新加坡：廣惠肇碧山亭，1960），頁79。

53　丁荷生、許源泰，《新加坡華文銘刻彙編 1819—1911（下冊）》，頁805。

54　丁荷生、許源泰，《新加坡華文銘刻彙編 1819—1911（下冊）》，頁805。

55　蔡珮蓉，《清季駐新加坡領事之探討（1877—1911）》（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八方文化企業公司，2002），頁50。

時運不齊，命途多舛，既傷溘逝，又乏葬基，丁鶴歸來，莫問九原之骨，杜鵑蹄處，難返故土」。[56]

碧山亭的成立跟新加坡開埠以後大量華人南來有關。他們不幸身故以後，無處安葬，故此廣惠肇三屬社群的成員便合資買地建墳。但碑文亦同時道出了碧山亭創立初期時的管理問題。碑文提及：

> 茲我廣惠肇三府所置之碧山亭，地方非不廣闊，今將芳名勒石，曾見前途歷次所捐巨款，糊塗了事，深為太息，豈可復蹈前轍乎？[57]

這透露了在碧山亭成立之初至1890年的約20年間，曾數次進行勸捐活動，但款項最終都不了了之，以致碧山亭未能得到完善的發展，可見當時墳山機構管理之不善。為了改善這個狀況，在時任碧山亭大總理梅湛軒的領導下，三屬社群展開了勸捐工作，以發展碧山亭墳山。

值得注意的是，梅湛軒在碑文的頭銜，除了是「建廟開馬車路大總理」外，更是「協理青山亭事務」與「協理綠野亭事務」。根據碑文標出的勸捐款項，共高達8589元。但當中碧山亭相關的事務的花費，只用了4699. 5元，而青山亭與綠野亭相關事務的花費，即分別佔2019. 5元、2158元。[58] 這種種跡象都顯示在19世紀末期，碧山亭、綠野亭、青山亭是處於三亭並存的狀態。也就是說，廣惠肇三屬人士除了銳意發展屬於廣幫的碧山亭外，亦同時積極參與廣、客兩幫七屬社群的組織。這表示廣惠肇三屬人士在這時期，同時建立兩種跨越幫群關係的身分。

在這些背景資料之後記錄了大量的人名，包括時任碧山亭值理與捐款者的名字。由於年代久遠，加上碑文的下半部分受到一定程度的侵蝕與破壞。故筆者以原碑為主，並參酌核對《新加坡華文銘刻彙編1819—1911》一書以及〈新加坡廣惠肇碧山亭碑刻整理〉一文中收錄的碑文內容，去蕪存菁，重新整理了碑文的捐款者名單。在此基礎之上，筆者再以《叻報》、《南洋商報》以及《星洲日報》三份戰前新加坡出版的華文報章為核心，並配以《新加坡各業調查》、《新加坡指南》等戰前出版的華文商業調查報告，逐一查

---

[56] 丁荷生、許源泰，《新加坡華文銘刻彙編 1819—1911（下冊）》，頁805。
[57] 丁荷生、許源泰，《新加坡華文銘刻彙編 1819—1911（下冊）》，頁805。
[58] 丁荷生、許源泰，《新加坡華文銘刻彙編 1819—1911（下冊）》，頁805。

找各人名、商號，以了解這些名字如何反映出19世紀末，新加坡廣東人社群的面貌。由於碑文上可辨識到的人名和商號眾多，經查找後，發現其中許多人名與商號均找不到相關資訊。同時，有不少相關的報導都出現在1950年代以後，這反映出這些報導的商號，可能只是同名。為免影響數據的眞實性，以及減低出錯的可能，本文以1942年，即以戰前為界，集中搜尋相關的報章內容。

經過多番對比與刪減所有模糊不清的名字後，在現存的碑文中，可以確定的人名與商號共有641個，這當中包括25位時任值理的人名。同時，捐款名單上，亦有多個反覆出現的名字和商號（見附表1）。縱觀整片碑文，共有61個人名及商號出現了2次；7 個人名與商號反覆出現了3次；其中廣興隆商號更反覆出現了4次。因此，把這些重複出現的名字刪減以後，碑文現存可辯識的人名及商號，共有572個。

（二）19世紀末新加坡廣東人的領導層

從碑文記載的碧山亭值理名單中，可以了解到19世紀末新加坡廣幫的領導階層。該值理名單以梅湛軒為首，如附表2所示，共有25個人名與商號名。梅湛軒是當時重要的華商與華人僑領。他於1842年來到新加坡，從事甘蜜與橡膠的種植。他從商的業務遍及新加坡及鄰近柔佛州的峇株巴轄（Batu Pahat）。[59] 祖籍廣東臺山的他，更代表廣幫參與殖民地政府所設立的華人參事局（Chinese Advisory Board），以作為殖民地政府與華人社群之間的橋樑。[60] 而他推行是次勸捐的目標，是要為碧山亭「建廟開馬車路」。 其子梅春浦，亦為25位值理之一。1908年，梅春浦接掌《南洋總匯新報》，為當時南洋華僑領袖中的「保皇黨」代表，支持清末立憲派人士所提出的君主立憲制；[61] 經常與陳楚楠、林義順等革命派成立的《中興日報》展開筆戰辯論。[62]

---

59 〈秦人一炬〉，《叻報》，1890年2月5日，版10；“Death of Mr. Boey Ah Sam,” *Straits Echo* (Singapore), 30 December 1913: 8。

60 《局紳委定》，《叻報》，1890年2月4日，版2。

61 〈梅春浦與總匯新報〉，《聯合早報》，2024年1月1 日，https://www.zaobao.com/lifestyle/columns/story20240101-1459031。

62 但詭譎的是，梅春浦在馬里士他路（Balestier Road）所興建的大宅「明珍廬」，卻在多番易主以後，成為了「晚晴園」，亦即今日的孫中山南洋紀念館。見〈梅春浦與總匯新報〉，《聯合早報》，2024年1月1 日，https://www.zaobao.com/lifestyle/columns/story20240101-1459031。

除了梅湛軒父子外，25位值理中，尚有梅旺、梅端成、梅怡和、梅奕琴、梅乃恆、梅基6人。除了梅旺、梅怡和與梅基的背景資料從缺以外，其餘人均為臺山端芬梅氏一族成員。而名單中的梅逐和，亦是由梅氏家族創立的雜貨商號。[63] 可見在25位值理中，梅氏一族共佔據了超過三分之一的名額。而縱觀整個勸捐名單，梅氏族人的名字共有24個，當中包括了至少4個冠以梅氏名字的商號。[64] 來自臺山端芬的梅氏家族，於1880年組織了（端芬）梅氏書室，後來更名為（端芬）梅汝南堂，為新加坡現存少數於19世紀成立至今仍持續運作的宗鄉組織。[65] 事實上，當初號召廣惠肇邑人置地建墳的梅南瑞，亦是臺山端芬梅氏族人。[66] 由此可見，梅氏一族於19世紀的廣幫，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除去梅氏族人以外，25位值理中的陳泗隆亦為臺山人士。足證臺山人為19世紀廣幫的領導者。

實際上，臺山人作為廣幫的領導者確是有跡可尋。自新加坡開埠以來，第一所華人宗鄉會館，正是由臺山人所成立的星洲譙國堂曹家館；而第一所華人地緣會館，亦是由臺山人所建的寧陽會館。兩所會館分別成立於1819年以及1822年，亦即新加坡開埠頭一年與第三年。[67] 兩所會館的創辦人均為臺山人曹亞志，他是英殖民地開埠者萊佛士 (Raffles) 船隊的成員之一。[68] 由此可見，臺山人是新加坡廣幫乃至整個新加坡華社的先驅者。

而在值理名單中，得與臺山人平分秋色者，就是一眾來自新會的商號。25名值理中，有6家來自新會的糧油雜貨商號，分別是羅奇生、朱廣蘭、朱有蘭、廣恆號、羅致生和同德號，他們與另一個在勸捐名單上的商號——朱

63　曾玲指出「逐和號」為梅湛軒所成立的商號，但在的記錄中，梅湛軒所設立的商號為「瑞和號」（Chop Swee Wo），見〈新加坡廣東移民省籍認同——海唇福德祠牌匾再解讀〉，《聯合早報》，2023年3月20日，版19；宋相旺著，葉書德譯，《新加坡華人百年史》（新加坡：中華總商會，1993），頁218。

64　這24個人名與商號，分別是梅湛軒、梅旺、梅遂和、梅端成、梅怡和、梅春浦、梅奕琴、梅乃恆、梅基、梅怡和號、梅逐成號、梅熊華、梅熊儀、梅熊祥、梅熊池、梅炳倫、梅炳昌、梅炳森、梅熊英、梅熊玲、梅熊杰、梅裕和、梅松栢、梅乃沛。

65　彭松濤編，《新加坡全國社團大觀 1982/1983》（新加坡：文獻出版公司，1983），頁M—42。

66　〈梅汝南堂蘊藏本地梅氏族人風雲史〉，《聯合早報》，2023年9月17日，https://www.zaobao.com/news/singapore/story20230916-1434072。

67　曹發利編，《星州譙國堂曹家館特刊》（新加坡：星州譙國堂曹家館，1985），頁77；黃文友，〈先賢曹亞志傳略〉，載黃載靈編，《新加坡寧陽會館一百三十週年紀念特刊》（新加坡：新加坡寧陽會館，1952），頁1。

68　黃文友，〈先賢曹亞志傳略〉，頁1。

富蘭，在19世紀被統稱為「中街七家頭」。文史學者區如柏指出，這批新會商人早於19世紀初已南來新加坡，並雄踞福建人發跡的直落亞逸中街(Market Street)，壟斷當時糧油雜貨的市場。[69]「七家頭」的影響力，具體還表現在他們的財力之中。碑文中記載的總募款金額是8589元，而單是「七家頭」的總捐款便高達1900元，佔總捐款的22%。同時，「七家頭」還是新加坡華人跨幫派組織——同濟醫院的第一任總理。[70] 這都反映出這批新會商人在19世紀新加坡華社的影響力。

由此足見，19世紀的新加坡，臺山及新會人居於領導地位。他們代表廣幫跟殖民地政府及其他華人幫群交涉。儘管值理名單中還有來自番禺的胡南生，亦即「黃埔先生」胡亞基。然胡亞基早卒於1880年，其名仍見於1890年的名單，很可能僅是胡亞基的後人以其名義來擔任值理和向碧山亭捐款而已。

（三）19世紀末新加坡廣東人的聚居地

碑文中記載的一眾商號，亦透露出廣東人在19世紀時的聚居地。如前段所言，19世紀的新加坡被劃分為多個民族區域，而華人即集中在新加坡河以南的地域，亦即是今天新加坡中央商業區一帶，地域範疇涵蓋牛車水(Chinatown)、克拉碼頭(Clarke Quay)、丹戎巴葛(Tanjong Pagar)等區。在此之下，華人會依據不同的方言「幫」群，再劃分各自的聚居地；廣東人則集中在牛車水(Kreta Ayer)一帶。[71] 陳康言在新加坡廣東人社會史的研究中，以廣幫一眾會館的地理位置為根據，推斷出戰前廣東人的主要聚居地，分別為牛車水及「十字路」一帶，亦即是今日文慶(Boon Keng)以及勞明達街(Lavender Street)附近地區。[72] 碑文所載的一眾商號，更能反映出在廣東人在19世紀末的聚居地，是集聚於新加坡市區地段。

69　區如柏，〈百年前稱霸中街的七頭家：紅菸、雜貨、醬園大王〉，載岡州會館編，《岡州會館成立一百五十週年紀念特刊》(新加坡：岡州會館，1990)，頁42—52。

70　黃賢強，〈從「幫群共治」到「幫群隱治」：同濟醫院領導層的跨方言群結構和演變〉，頁135—137。

71　在今天的新加坡語境之下，牛車水涵蓋丹戎巴葛(Tanjong Pagar)、武吉巴梳(Bukit Pasoh)、水車路(Kreta Ayer)和直落亞逸(Telok Ayer)的鄰里。但在戰前新加坡，牛車水乃指水車路一帶而已，而這亦是廣東人主要的眾居地。詳見王振春，《獅城老街故事》(新加坡：玲子傳媒，2012)，頁10—13。

72　Hong-Yin Chan,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Cantonese Chinese Community in Singapore," *Translocal Chinese: East Asian Perspective* 16: 2 (2022): 162-166.

經多方查考後，碑文的商號名單中，共有112個能夠找到相關的地址。唯其中僅半數，即56個商號名稱，能尋得具體的街道與街號。其餘有38個商號，尚可求得大概的街道位置，其中還有10個商號，擁有2處或以上的地址。這是由於19世紀時，新加坡的商業註冊法尚未成熟，經常出現同名商號的情況。在此情況下，筆者選擇將查找到的商號地址全數記錄，以免缺漏。而其餘8個商號，則來自其他幫群的商號。在屬於廣幫碧山亭的碑文，尚能看到為數不少的非廣幫商號，亦側面反映19世紀末華人各幫群之間的相互合作。

筆者使用地理資訊系統 ARCGIS，將所查找到的地址，以點列的方式置於1911年出版的新加坡歷史地圖 *Map of the Island of Singapore and its Dependencies 1911*。從附圖1中，可以看到4種不同的標記，分別代表了：查找到具體街道與街號位置的商號、查找到大概街道與街號位置的商號、擁有2個或以上的地址的商號名稱、非廣幫的商號位置。這張地圖除了可以直觀地看到一眾商號的地理位置外，更能從中推斷出廣東人的聚居地。

從地理分布上，可以看到絕大多數的商號，都集中在新加坡河的兩岸，亦即新加坡的市區地段，當中又以新加坡河南岸的地域為主。超過一大半的標示，均位於南岸的牛車水，亦即橋南路（South Bridge Road）和新橋路（New Bridge Road）兩條主幹道周邊的地方。這一帶亦是早期南來的廣東人的第一個聚居地。附圖1中小圖的紅框範圍，就是牛車水的邊界範圍。此外，有不少的標示，是在丹戎巴葛以及直落亞逸一帶，亦即附圖1中小圖的綠框範圍。自新加坡開埠以來，這地方都是福建人的主要聚居地。[73] 根據查找的資料所得，在直落亞逸的廣幫商號，基本上都是以新會商人的「七家頭」為首的雜貨店。與時同時，在牛車水範圍內，亦有其他幫群的商號出現。這再次反映出，幫群之間壁壘分明的情況至19世紀末已經得到改善。

（四）19世紀末新加坡廣東人的行業

另一種彰顯出新加坡華人「幫」群政治的特徵，是行業的專門化現象。在殖民地的華人商業領域中，「幫權」與行業關係密切，某些行業會被特定的「幫」群所壟斷。再加上方言群之間地域空間的分布，亦為各自的商業活

---

[73] Guan-Hock Lim, "Chinatown: Cradle of Chinese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eds. Chong Guan, Kwa and Kua Bak Lim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2019), 80-81.

動提供地理與經濟基礎。[74] 故此，在《勸捐碧山亭小引及捐款芳名》中記錄的商號，一方面集中在市區，另一方面亦大可歸類為某幾種主要的行業類型。碑文上的眾多商號映照出廣東人在行業上的多樣性，而這些不同類型的行業，亦反映出廣東人在19世紀末新加坡的社會面貌。

碑文中記錄的眾多商號，能夠查找到戰前的相關資料的共有148個。當中14個確定是屬於閩、潮、客、瓊的商號。換言之，餘下134個商號可推斷為廣幫商號。與查找商號地址時的狀況類同，當中13個名字出現同名商號的情況，亦即表示不同行業分別擁有相同的品牌名稱。為免出現缺漏的情況，筆者同樣將查找到的商號資料全數記錄，並製作成附表3、附表4，以便更詳細地了解廣幫的行業狀況。

根據附表3所示，碑文上的一眾商號可分為8大類，分別是糧油雜貨、金銀典當、建築運輸、製衣成衣、日常用品、餐飲旅遊、中醫藥業，以及非典型行業。這些行業大都是以本地產業為主，除了糧油雜貨與建築航運兩個類別是相對屬於主導性的產業以外，其剩均屬個人服務與手工藝行業。與以投資甘蜜種殖園區，設立銀行，積極建立商業網絡的福建與潮州社群相比，廣東人的經濟實力相對較弱。[75] 同時，這亦解釋了何以廣東人的聚居地落於新加坡的市區地域，而非其他農村園地之中。

從行業分類來看，多達53個商號，是屬於雜貨類行業，亦即是售賣香煙和柴米油鹽醬醋茶等各類產品的商鋪。新會商人在這其中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除了上文提及到的「七家頭」，碑文上尚有統稱為「小七家頭」的糧油雜貨商，亦即是廣祥泰、廣昌榮、廣泰號、廣南興、羅蘭生。歐如柏指出，這些商號都是由「七家頭」的親族或同鄉所成立。[76] 這些商號的出現，進一步鞏固了新會商人在雜貨行業的地位。他們自廣東原鄉引入大量貨物來新加坡，再出售給在地華人。其交易數額之鉅，亦引來殖民地政府的關注。在1876年的《海峽殖民地年度報告》(Annu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中，殖民地政府注意到華人大量購入運自中國的民生用品，包括衣物、食材、藥物等應有盡有，貿易額更逐年遞增。這反映出雜貨商品市場在新加坡

---

[74] Lim-Keak Cheng, *Social Change and Chinese in Singapore: A Socio-Economic Geograph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Bang Structure*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5), 89-90.

[75] Lim-Keak Cheng, *Social Change and Chinese in Singapore,* 95.

[76] 〈碩果僅存的小七家頭　廣祥泰走過了一世紀〉，《聯合早報》，1989 年 1 月 22 日，版40 。

的活躍程度。[77] 由於貨物的主要來源地是廣東地區，所以又稱之為「廣貨」。根據陳康言的研究，除了新會商人，同屬廣惠肇社群的鶴山商人亦在香港街一帶經營雜貨街業。[78] 到了20世紀初，在這批新會與鶴山商人的主導之下，星洲雜貨行以及星州廣貨行先後於1907年以及1939年成立。[79]

事實上，廣東人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陸續建立為數不少的業緣組織，這些組織恰好對應了碑文上各類型的商號。如附表3中所示，有關金銀典當的組織包括了1908年成立的金銀工業星洲分會和1929年成立的星洲敬時行。[80] 又如早在1867年成立的北城行，是新加坡第一個以行業為基礎的組織，組成成員迺是一群廣東的建築從業人員。[81] 1890年成立的星洲魯北行，即是由建築工友所成立的社團。[82] 1928年成立的星洲機器行與1934年成立的華人機器商行，亦是由廣東機器從業員與店東所成立的組織。[83] 這幾個組織均與碑文上建築運輸的行業有關。此外，1880年成立的軒轅館洋衣行、1910年成立的中國綢布雜貨入口商聯會 、1937年成立的華人洋服工會，以及1940年成立的華人洗衣工會，都是屬於戰前由廣幫成員所建立與製衣成衣相關的行業組織。[84]

而有關日常生活類的行業，亦組成了不同的團體，有些更會冠以「廣幫」之名，以別於其他「幫」群的同類型組織。例如廣幫豬肉行與

---

[77] *"1876 Straits Settlement Annual Report"* in *Annu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55-1941, Volume II*, 286.

[78] Hong-Yin Chan,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Cantonese Chinese Community in Singapore,"171.

[79] 星洲雜貨行，《星洲雜貨行五十週年金禧紀念特刊》（新加坡：星洲雜貨行，1957），頁8；星洲廣貨行，《星洲廣貨行第十四週年紀念特刊》（新加坡：星州廣貨行，1953），頁2。

[80] 〈金銀工業星洲分會慶祝四十五週年紀念〉，《星洲日報》，1953年12月6日，版6；〈敬時行已批准成立〉，《星洲日報》，1929年11月7日，版7。

[81] 彭松濤編，《新加坡全國社團大觀 1982/1983》，頁 C—65。

[82] 吳華，《新加坡華族會館志（第三冊）》（新加坡：南海學會出版，1977），頁12。

[83] 〈華人機器工會慶祝三十四週年紀念〉，《星洲日報》，1962年8 月10日，版8 ；〈機器工業資方中人迎組華人機器商行〉，《南洋商報》，1934年8月7日，版9。

[84] 軒轅洋服商會，《新加坡軒轅洋服商會百年慶典紀念特刊》（新加坡：軒轅洋服商會，1980），頁58；〈中國綢布雜貨入口商聯會明年度職員〉，《南洋商報》，1946年12月23日，版6；〈華人洋服工會訂期慶祝十六週年〉，《南洋商報》，1952年6月9日，版5；〈星華洗衣公會籌委已選出〉，《南洋商報》，1940年2月1日，版9 。

廣幫生菓商行。[85] 有關印刷行業的組織，則有中華印刷業工會與印務同業公會。[86] 1876年成立的姑蘇愼敬堂則是以廣幫為代表的餐飲協會。[87] 愼敬堂更是碑文上其中一個捐款的名字。這些行業組織的成立，亦反映出廣幫商業的多樣性。

然而，在中醫藥業這個範疇，即出現不一樣的情況。在戰前的新加坡，並沒有出現跟廣幫相關的中醫藥業業緣團體。這是由於新加坡的中醫藥業團體跟「幫」群的關係並不大。根據楊妍的研究，戰前在新加坡出現的中醫藥團體主要有1929年成立的中醫中藥聯合會。這個組織涵括不同「幫」群的成員在內。而中醫藥組織成立更多是與民國政府的「廢止中醫案」與新加坡政府的不干預政策有關。因此，在2000年以前，新加坡的中醫藥發展都是由華人民間組織所推動。[88]　在碑文的捐款名單上，亦有至少2個來自客幫的中藥商號，分別為廣仁堂與德生堂。由此可見，中醫藥行業在新加坡的發展，正反映出即便在戰前的新加坡，「幫」群之間的行業專門化現象，並非是必然的。

碑文中尚有一批非主流行業的組織，包括了新客館、煙館、妓院，以及七姐會。這些組織不屬一般商業活動，卻能側面反映19世紀末的廣東人在新加坡的生活情況，以及廣幫的社會面貌。新客館的出現，代表華人苦力貿易的盛行。「新客」是泛指從閩粵兩地南來的勞工，但崔貴強卻認為「新客館」一詞，不過是進行苦力貿易的「豬仔館」為了掩人耳目的手段。[89] 碑文上提到的新客館，分別有廣合源號、廣泰和，以及閩幫的金勝發。當時廣幫最重要的「新客館」當屬廣合源號，他們有能力捐款30元至碧山亭，凸顯他們豐厚的財力。苦力貿易充斥於海峽殖民地，在1881年的檳榔嶼年度報告

---

[85] 星洲豬肉行，《星洲豬肉行60週年鑽禧紀念籌募國家體育基金遊藝大會》（新加坡：星洲豬肉行，1967），頁2；〈生菓商行今日週年紀念〉，《南洋商報》，1940年8月15日，版7。

[86] 〈中華印刷業工會開會闡揚勞動精神並報告改會名及蒙政府批准註冊〉，《南洋商報》，1947年5月3日，版5；〈資方組織已實現 參加者四十餘家 定名「印務同業公會」〉，《南洋商報》，1936年12月22日，版5。

[87] 姑蘇愼敬堂，《姑蘇愼敬堂九十週年紀念特刊》（新加坡：姑蘇愼敬堂，1966），頁7。

[88] Yan Yang,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in Singapore," in Vivienne Lo, Michael Stanley-Baker and Dolly Yang ed., *Routledge Handbook of Chinese Medicine* (London: Routledge, 2022), 528-531.

[89] 崔貴強，〈乘風破浪下南洋——早期華族移民浪潮〉，載柯木林編，《新加坡華人通史》（新加坡：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2015），頁54。

(1881 Penang Annual Report) 中，華民護衛司嘉爾 (E. Karl) 便提到新客的工作環境苛刻。[90] 且這些苦力經常吸食鴉片煙，殖民地政府甚至留意到，多達四分之一的苦力，保有吸食煙片煙的習慣。[91] 這亦解釋煙館出現的原因。苦力行業也代表19世紀南來華人普遍的生活模式。

妓院跟七姐會，則反映廣東女性在新加坡的兩種面向。七姐會是一種有着商業性質的女性宗教組織。黃鈺清指出，19世紀末的新加坡，來自廣東的女性，佔新加坡整體女性人口的三分之一。在人數上，遠高於其他華人「幫」群的女性人口。因此，新加坡亦出現一些以廣東女性為主的民間組織。這一類型的組織帶有濃厚的宗教意味，往往以女性神祇為組織的凝聚核心，包括信奉觀音的「觀音會」，祭祀媽祖的「娘媽會」，以及碑文上提到的慶祝七夕的「七姐會」。黃鈺清進一步指出，七姐會的成立與運作，反映廣東女性在新加坡的生活，是帶有一定的能動自主性 。[92] 碑文中可確定為七姐會的名字共有2個，分別是順利堂和廣順利。

但與此同時，碑文中眾多的妓院商號，亦反映出廣東女性被社會邊緣化的一面。經查找後，碑文上確定是屬於妓院的商號名共6個，分別是順月樓、勝花樓、合意樓、順意樓、順心樓和愛月樓。然縱觀整片碑文，被冠以「樓」字的商號共多達40個。這一定程度反映娼妓行業的鼎盛。殖民地政府在1881年的海峽殖民地年度報告 (1881 Straits Settlements Annual Report) 中，曾提及華人娼妓在新加坡的人數多達6000餘人。她們處於惡劣的工作環境，亦導致性病肆虐。[93] 清人李鍾珏在1876年到新加坡遊覽時，亦記下了當時娼妓行業的情況。他指出：

> 牛車水一帶，妓館櫛比，聞注籍於護衛司之妓女，共有三千數百人，而此外之私娼女伶，尚不計其數。皆廣州府人，或自幼賣出洋，或在坡生長者。[94]

---

[90] "1881 Penang Annual Report" in *Annu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55-1941, Volume III*, 170.

[91] "1881 Malacca Annual Report" in *Annu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55-1941, Volume III*, 195-196.

[92] Lynn, Yuqing Wong, "Ascending the Milky Way: Seven Sisters Festival and the Religious Practices of Cantonese Women in Singapore," *Religions*14: 3, 406, (2023): 1-23.

[93] "1881 Straits Settlement Annual Report" in *Annu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55-1941, *Volume III*, 163.

[94] 李鍾珏，《新嘉坡風土記》（新加坡：南洋編譯所，1947），頁27。

由此可見，在19世紀末，廣東女性是娼妓行業的主要從業群體，她們集中在廣幫聚居地的牛車水。這個行業的蓬勃發展，也反映出廣東女性在19世紀末的新加坡，位處於社會較邊緣的位置。

五、結論

新加坡華社的發展是一個漫長且不斷變動的過程，而19世紀末正是華人各「幫」群之間融合的開端時期。《勸捐碧山亭小引及捐款芳名》所反映的，正是19世紀末新加坡華社「幫」群的一個典型的案例。通篇碑文的人名與商號，均以廣、惠、肇廣幫三屬社群為主。透過詳細探討碑文上的內容，可從領導階層、聚居地、行業特性等各方面，全盤了解廣幫在19世紀末的社會狀況。三屬社群的形成與發展，正是19世紀以來，「幫」群政治下的結果。這種在遠離原鄉的殖民地下，跟各華人「幫」群互動下甫形成的三屬廣幫認同，正是「廣東性」在新加坡發展出來的獨特之處。

19世紀末新加坡「廣東人」地緣概念的形成，並非僅由原鄉地域意識所決定，而是在特定移民社會中，與業緣結構及其所塑造的社會網絡和空間分布密切相關。《勸捐碧山亭小引及捐款芳名》所呈現的籍貫與職業信息，恰好揭示了廣東人群體在行業分布、社會交往與城市空間中的實際運行方式。業緣並非地緣概念之外的附屬因素，而是參與塑造「廣東人」地緣認同的重要機制之一。

其次，碑文亦反映出「幫」群結構，並非靜態，而是動態的一面。在碑文可以尋得20個屬於閩、潮、客、瓊四幫的人名與商號。這些名號的出現，一方面代表「幫」群之間所存在的互動性；但另一方面，非廣幫名字僅佔碑文名單的不足百分之五，亦反映出這種跨「幫」群的互動，仍屬萌芽階段。而在邁入20世紀後，廣幫乃至整個新加坡華社均表現出進一步的融合與發展。學界普遍認為20世紀是新加坡華社融合的一個重要時期。1906年成立的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更被視為新加坡華人「幫」群結構被制度化的一個結果。[95]

中華總商會的成立之初，實為延續19世紀的「幫」權結構。擔任最高決策層的董事局總理與副總理，皆須由閩幫與由潮、粵、客、瓊聯合的粵幫各

---

[95] Huei-Ying Kuo, *Networks beyond Empires: Chinese Busines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Hong Kong-Singapore corridor, 1914-1941* (Leiden: Brill, 2014), 59-60.

推舉人選，輪流擔任。林孝勝指出，中華總商會的成立，為各「幫」群提供了一個正式的平臺，以協商或調停方式來解決各「幫」之間的衝突。[96] 劉宏與黃賢強認為，縱使新加坡華社在20世紀的前半葉，已跳脫出「幫」群政治，並為日後華社的發展奠下基礎；他們主張戰後新加坡的華人社群在政治意識上的轉向，由「僑居者」過渡至「定居者」，才是徹底改變華社面貌的關鍵原因。[97] 以是，《勸捐碧山亭小引及捐款芳名》一碑文足證，從時間點而言，19世紀末的新加坡，華人「幫」群政治雖仍處於各自為政的階段，但已逐漸露出交流與融合的現象。

（責任編輯：武勇；實習編輯：王后）

---

[96] 林孝勝，〈神權・紳權・幫權——幫權結構與幫權政治〉，頁87。

[97] Liu Hong and Wong Sin Kiong, *Singapore Chinese Society in Transition: Business, Politics, and Socio-Economic Change, 1945-1965* (New York: Peter Lang, 2004), 1-9.

附表1：《勸捐碧山亭小引及捐款芳名》中反覆出現的名字和商號

反覆出現2次					
1）	羅奇生	21）	廣利隆	41）	時昌號
2）	朱廣蘭	22）	廣信號	42）	崑昌號
3）	梅遂和	23）	錦隆號	43）	廣生棧
4）	朱有蘭	24）	公和號	44）	廣南合
5）	胡南生	25）	祺生棧	45）	廣榮昌
6）	廣恆號	26）	悅香樓	46）	廣泰昌
7）	羅致生	27）	綸盛號	47）	恆昇號
8）	同德號	28）	同豐號	48）	廣南興
9）	祥信號	29）	恆泰號	49）	廣祥盛
10）	廣福隆號	30）	成發廠	50）	勝和堂
11）	以義號	31）	廣昌號	51）	廣同利
12）	順月樓	32）	成和號	52）	廣茂利
13）	友信號	33）	就和號	53）	羅蘭生
14）	廣晉隆	34）	恆源號	54）	和興號
15）	吉祥泰	35）	存勝堂	55）	全昌號
16）	廣昌榮	36）	勝花樓	56）	廣合和
17）	永興隆	37）	新彩雲	57）	廣昌和
18）	義安號	38）	新同利	58）	永昌號
19）	劉燦光	39）	益盛號	59）	怡泰號
20）	廣勝棧	40）	廣南茂	60）	泉生號
				61）	廣紹安
反覆出現3次					
1）	廣泰和	4）	恆和號	7）	新廣和
2）	廣祥泰	5）	裕和號		
3）	福順利	6）	美和號		
反覆出現4次					
1）	廣興隆				

資料來源：丁荷生、許源泰，《新加坡華文銘刻彙編 1819—1911（下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頁804—805。

附表2：《勸捐碧山亭小引及捐款芳名》大總理與值理名單

順號	名字	籍貫	商號名	商號性質
1）	梅湛軒	廣東臺山	／	／
2）	梅旺	／	／	／
3）	何幹臣	廣東	／	／
4）	／	／	羅奇生	糧油雜貨
5）	／	新會	朱廣蘭	糧油雜貨
6）	／	／	梅遂和	雜貨
7）	／	新會	朱有蘭	糧油雜貨
8）	胡南生	廣東番禺	／	／
9）	／	新會	廣恆號	糧油雜貨
10）	蔡貞	／	／	／
11）	梅端成	廣東臺山	／	／
12）	梅怡和	／	／	／
13）	潘日華	／	／	／
14）	陳泗隆	廣東臺山	陳泗隆	雜貨店
15）	梅春浦	廣東臺山	／	／
16）	梅奕琴	廣東臺山	／	／
17）	梅乃桓	／	／	／
18）	／	新會	羅致生	糧油雜貨
19）	謝若泉	／	／	／
20）	梅基	／	／	／
21）	鍾其光	／	／	／
22）	馮璧光	／	／	／
23）	鄧水	／	／	／
24）	／	／	呂樹棠	當店
25）	／	新會	同德號	糧油雜貨

資料來源：丁荷生、許源泰，《新加坡華文銘刻彙編 1819—1911（下冊）》，頁804—805。

附表3：《勸捐碧山亭小引及捐款芳名》中商號的行業分類

類別	糧油雜貨	金銀典當	建築運輸	製衣成衣	日常用品	餐飲旅遊	中醫藥業	非典型行業
行業	雜貨店、醬園、賣米、煙酒、洋貨	當鋪、飾品、金業、鐘錶	工廠、造船、輪船、機器行、木廠、汽車	綢布莊、洋服、洗衣、皮革	食品、肉類、傢品、花商、理髮、信局、印刷	客棧、餐廳、咖啡室	藥材、中醫、牙科	新客館、妓院、煙館、七姐會
數量	53	11	18	19	18	7	12	11
相關業緣組織	雜貨行、廣貨行	金銀工業星洲分會、敬時行	北城行、魯北行、機器行、華人機器商行	軒轅館洋衣行、中國綢布雜貨入口商聯會、華人洋服工會、華人洗衣公會	廣幫豬肉行、中華印刷業工會、印務同業公會、廣幫生菓商行	姑蘇愼敬堂	/	/

資料來源：丁荷生、許源泰，《新加坡華文銘刻彙編 1819—1911（下冊）》，頁804—805。

附表4：《勸捐碧山亭小引及捐款芳名》中商號名單

類別	商號名字
糧油雜貨	羅奇生、朱廣蘭、梅遂和、朱有蘭、廣恆號、陳泗隆、羅致生、同德號、朱富蘭號、何發順號、永生號、生茂號、廣祥生、長盛號、友信號、廣祥泰、吉祥泰、廣昌榮、廣泰號、永興隆、廣源隆、廣利隆、公和號、廣昌號、成和號、廣生隆、廣泰昌、廣南興、廣祥興、勝和號、羅蘭生、和隆號、廣和興、廣兆隆、萬昌隆、乾生號、和發號、廣振隆、榮興號、振昌號、廣生興、廣源號、南昌號、廣成昌、義南興、廣祥茂、昌記號、萬興隆、廣致和、聯益號、新合和、廣萬生、利昌號
金銀典當	呂樹棠、祥信號、廣興隆、萬源當、成發當、何利南、廣生隆、廣益隆、永昌號、榮興號、興昌號
建築運輸	廣福隆號、新巨泰號、廣福昌、以義號、廣勝棧、新義興、成和號、廣泰昌、長茂號、長茂號、廣源昌、廣和興、萬昌號、泰昌號、和合號、新興號、和昌號、大成號
製衣成衣	南興隆號、公興祥號、湯廣生號、廣榮盛、廣發棧、森茂號、廣南利、新廣和、廣生隆、廣祥盛、福興隆、錦華彰、和勝號、廣興號、廣福泰、廣美號、永昌隆、興昌號、新昌盛
日常用品	廣昌生、元亨號、生發號、廣福祥、永裕隆、協和號、福順利、裕和號、廣生隆、新勝和、廣源興、廣同昌、新南茂、振美號、新萬利、昌記號、大成號、新昌盛
餐飲旅遊	廣南勝、祺生棧、福瑞隆、敬愼堂、泰昌號、和珍號、廣順昌
中醫藥業	同安堂、萬源店、吉祥泰、介福堂、張春田、頤壽堂、新彩雲、錦興號、人和堂、敬仁堂、廣德堂、鄒世昌
非典型行業	廣合源號、廣泰和、順月樓、廣利隆、順利堂、勝花樓、合意樓、順意樓、順心樓、愛月樓、廣順利

資料來源：丁荷生、許源泰，《新加坡華文銘刻彙編 1819—1911（下冊）》，頁804—805。

附表5：《勸捐碧山亭小引及捐款芳名》中非廣幫商號名單

幫群	商號名字
閩幫	同益號、茂成和、金勝發、同興號、天益號、益隆號、和源號、恆利號
潮幫	永吉祥號、生茂號、義安號、新順利、天然號、義合號、德記號
客幫	恆興號、廣仁堂、大生號、德生堂
瓊幫	新合盛

資料來源：丁荷生、許源泰，《新加坡華文銘刻彙編 1819—1911（下冊）》，頁804—805。

附圖1：19世紀末廣幫商號分布圖



十九世紀末廣幫商號分佈圖

圖片說明：根據《勸捐碧山亭小引及捐款芳名》所記錄的商號資料，並標記於 *Map of the Island of Singapore and its Dependencies 1911*之上。

The Multiple Meanings of "Cantonese"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Singapore:
A Study of "Invitation to Contribute to the Peck San Theng and List of Donors" from the Kwong Wai Siew Peck San Then

Donald Hong Yin CHAN
Wu Jieh Yee School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Hong Kong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Qi WU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Behavioural
Sciences,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Singapore, the term "Cantonese" is not a fixed, clearly defined group of people but rather a concept that is constantly being shaped and constructed. "Cantonese" refers neither to a group speaking Cantonese nor to people from Guangdong Province. Instead, it is understood as immigrants from Guangzhou Prefecture, Zhaoqing Prefecture, and Huizhou Prefecture, the three administrative regions in central Guangdong Province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Borrowing conceptually from Fredrik Barth, the notion of "Cantonese" as an ethnicity is not a primordial or intrinsic essence but rather a historical

Donald Hong Yin CHAN, Wu Jieh Yee School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Hong Kong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Room A615, 30 Good Shepherd Street, Ho Man Tin, Kowloon; E-mail: chanhy@hkmu.edu.hk. Qi WU,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Behavioural Sciences;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Social Sciences; 463 Clementi Road Singapore 599494; E-mail: wuqi@suss.edu.sg.

Journal of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vol. 24, no. 1 (April, 2026): 143-173

product of power relation between self-ascription and ascription by others in interaction across varying spatial and temporal cognition.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first stele of the Kwong Wai Siew Peck San Theng, "Invitation to contribute to the Peck San Theng and list of Donors", to trace changes in the notions of "Cantonese" in nineteenth-century Singapore. Previous studies have outlined the historical factors leading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ck San Theng and its subsequent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ck San The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uang bang is little documented. The donor list in "Invitation to contribute to the Peck San Theng and list of Donors" provides insights into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Guang bang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Singapore. This article uses this stele and a wealth of primary sources to reconstruct the formation and deduction of the geographical concept of the "Cantonese" in the context of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Singapore.

Keywords: Singapore, Kwong Wai Siew Peck San Theng, Cantonese, Guang bang, "Invitation to contribute to the Peck San Theng and list of Donors"